

近三年来“丁戊奇荒”研究综述

谭 强

新疆大学历史学院, 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 2026年1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2月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2月24日

摘 要

“丁戊奇荒”作为一场席卷整个华北地区的特大灾难性事件, 对于之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即便是在近三年以来, 对于它的研究热度依旧很高, 本文主要对近三年关于“丁戊奇荒”学术研究成果按照不同的研究视角进行了综述以及和早期学者的研究进行比较, 并为进一步推动“丁戊奇荒”的研究做了展望。

关键词

丁戊奇荒, 山西, 赈灾, 治理

A Review of Research on the “Dingwu Famin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Qiang Tan

School of History, Xinjiang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anuary 12, 2026; accepted: February 6, 2026; published: February 24, 2026

Abstract

The “Dingwu Famine” was a catastrophic event that swept across the entire North China region, exerting a comprehensive influence on Chinese society thereafter. Even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the research on it has remained highly popular. This article mainly reviews the academ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on the “Dingwu Famin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nd compares them with the studies of earlier scholars, and makes prospects for further promoting the research on the “Dingwu Famine”.

Keywords

Dingwu Famine, Shanxi, Relief, Governance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中国近代华北区域社会灾荒史中,光绪三年(1877)的“丁戊奇荒”对于华北地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场罕见的特大灾荒波及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五省以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这场持续三年大面积干旱具有时间长、范围大、后果严重的特点。大旱不仅使农产绝收,田园荒芜,而且“饿殍载途,白骨盈野”,饿死的人数竟达一千万以上。时人称“二百三十余年来未有之惨凄、未闻之悲痛”,甚至说这是古所仅见的“大侵奇灾”。当时的外国旅华人士也把它看成是中国古今以来的“第一大荒年”由于这次大旱以1877年、1878年为主,而这两年的阴历干支纪年属丁丑、戊寅,所以人们称为“丁戊奇荒”;又因河南、山西旱情最重,又称“晋豫奇荒”“晋豫大饥”。关于此次灾荒的血泪史书不绝于耳,在灾荒中各地的人口锐减,社会元气大伤,长期处于恢复、停滞甚至倒退状态。直到新中国的成立很多地区的人口依旧未能恢复到灾前水平,灾荒造成的生产力损失、物质财产损失、人才损失、文化损失,长期无法弥补和平复,对社会的发展造成了深刻影响。

丁戊奇荒对我国北方近代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同时,华北当时经济、政治的发展也不可避免地使得丁戊奇荒带上了自己的时代特色。当我们在对华北各省区域社会史开展研究时,“丁戊奇荒”都是绕不开的话题,只有对其进行全方位的认识才能准确把握华北地区乃至整个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脉络。

近三年来,针对“丁戊奇荒”并没有出现新的专著,至于之前出版的有关“丁戊奇荒”的专著和资料汇编王鑫宏[1]已有相当精确的总结,在此不再赘述。近三年来关于“丁戊奇荒”方面的学术性论文的研究成果可谓是十分丰富,可见众多学者都对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本文总结了从2021年至今三年来国内关于“丁戊奇荒”的相关论文的研究现状,并对他们的论文各自进行了综述,希望能够对众多关注此领域的研究者提供思考,并做了以下分类。

2. 聚焦于省、府、县的区域范围研究

阎允澜[2]在论文中运用了青州府志等相关史料对“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受灾情况和影响、青州府受灾严重的原因以及青州府的赈灾工作进行了叙述。在受灾情况中用表格的形式对青州府各村庄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详细的数据统计,让我们更直观地感受到了青州府受灾的严重性。在青州府的受灾严重的部分中除了列举的自然因素,更重要的是对吏治腐败、仓储空虚、战争频繁、酿酒业兴盛所导致的储备粮食的减少、人地矛盾严重的社会因素进行了细致的分析,这些社会因素都结合了青州府的实际特殊情况来说明在“丁戊奇荒”中的受灾情况。最后的赈济工作也分为官方和民间的两条主线反映的是赈灾主体、方式和措施的多样化。

青州府是丁戊奇荒中受灾比较严重的一个府,同时也是具有大量史料记载的一个府,研究青州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阎允澜在丁戊奇荒中针对青州府的研究可以说是对青州府的实际情况的研究,是丁戊奇荒地方性研究的补充。在历史书写中针对青州府的特殊情况,分析了一些与大多数府州不一样的原因

和救济方式，我们也可以从中得出在丁戊奇荒中其他各地灾荒成因和影响的共同点。

朱海啸[3]聚焦于灾后山西方志修订的史料，探讨了光绪初年对于方志修订的风潮与“丁戊奇荒”的关系和“丁戊奇荒”对于山西方志内容的影响，也探讨了皇恩浩荡、人口凋零、乡贤赈济与底层灾民的挣扎四个不同叙述角度在不同地区不同修志过程中所呈现的不同历史记忆。主要运用了山西各州县的地方志的史料来说明“丁戊奇荒”和灾后方志内容的关系，最后得出灾后方志的书写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丁戊奇荒”对于地方的文化影响是全方位的，即便是在官方的主导下的方志也被打上了浓厚的灾荒气息，无论是考证史实还是追寻观念上的真实，都需要借助这批方志，其中蕴藏的丁戊奇荒记忆，为我们提供了多种进入丁戊奇荒的角度和诠释的可能。

朱海啸最大创新点就是对于新的地方方志史料的挖掘和运用，通过对方志中构建的历史记忆来对“丁戊奇荒”的历史形成一个更全面的认识角度。可以说是方志学、文献学与灾荒史研究的一个有力的结合，利用各个州县的方志记忆进一步证明了丁戊奇荒对于山西各州县的影响的全方位。

连伟光[4]将“丁戊奇荒”的考略聚焦于受灾比较严重的晋东南地区的泽州府，运用了泽州府以及之下的地方方志的史料对“丁戊奇荒”在泽州府的灾情和由灾荒引发的社会问题进行了相应的梳理。同时通过史料的整理对致灾的自然原因和社会因素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最后对泽州府的赈灾的种类与措施进行了归纳。

连伟光对于泽州府的研究也可以说是山西省丁戊奇荒研究的一个缩影，其选择的研究对象在山西具有代表性，因为我们可以从泽州府的灾荒成因、过程、以及赈灾措施看到整个山西省的情况，这篇论文以泽州府为叙述地点来对“丁戊奇荒”的过程进行书写和以山西省或者整个华北地区为区域书写的范围相比较来看的话，内容上其实并无太大的区别，两者之间是属于细胞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一样，从泽州府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山西地区、甚至整个华北地区在“丁戊奇荒”中的受灾情况、成因、赈灾情况，体现的是一个由此及彼的过程，可以“观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武超逸的《“丁戊奇荒”时期平遥县的灾情与赈济——基于光绪版〈平遥县志〉记载》[5]，本文以光绪版《平遥县志》为核心史料，对山西省平遥县在“丁戊奇荒”时期的灾情和赈灾情况进行了叙述。本文将研究范围限定在最小一级的县级行政单位，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更为基层、接近现实的“丁戊奇荒”受灾情形和各个群体在面对灾荒时的具体举措，体现的是平遥县在赈灾过程中选择的因地制宜的方式对灾情进行的救济和恢复。

“丁戊奇荒”的研究聚焦于县级单位，不能说是最小的研究单位，确实也是我们对于丁戊奇荒研究聚焦于更基础层面的有力尝试。由点及面，与整个山西省区域的情况来看是共性与个性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为我们在“丁戊奇荒”研究县一级的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提供了一个研究模板，值得我们借鉴。

综上所述，近三年来将研究范围聚焦于省州县的区域范围的研究，都运用了当地的地方志等史料，是对“丁戊奇荒”研究新史料的挖掘，极大丰富了关于“丁戊奇荒”研究的史料。同时这些论文都对各自地区的基本受灾情况、灾害成因、灾情救济和恢复进行了探讨，让我们看到了各自地区不同的受灾情况和各自采取的具有当地特色的赈灾措施，为我们展现了更为全面、鲜活的“丁戊奇荒”的历史场景。就这些研究区域来看，主要还是对于山西各地区的历史叙述，其他各省的研究相对较少，同时这些论文主要运用了方志类的新史料，然而有些论文就灾荒言灾荒，没有做到由点及面、以小见大，缺乏对整体的“丁戊奇荒”的把握，容易陷入“碎片化”的陷阱，同时这些论文依旧没有逃脱传统的历史叙述方式，缺乏理论的创新和总结。

针对区域性的丁戊奇荒的研究，之前郝平[6]的专著是研究的典范，在他的书中对“丁戊奇荒”中山西各地区的灾情进行了叙述，重点整理了山西高、中、低各层级官员的救济措施与救荒思想，同时也对

义赈和地方绅商自发组织的赈灾行为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长期发挥稳定作用的一种调节机制，更是一种不成文的惯例和规范。在史料上运用了各个地方的方志、碑刻、日记、档案等作为史料支撑。最后对“丁戊奇荒”给山西造成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认为山西近代化的进程因此而迟滞，并反思到人为破坏环境将会使自身受到更大的惩罚，任何时候都不可动摇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郝平的选取范围是山西省，是“丁戊奇荒”区域范围研究的一个标杆，阎允澜聚集于青州府，朱海啸聚焦于泽州府以及武超逸以平遥县为研究对象，相对于之前他们更加聚焦于更小范围的研究，突出“丁戊奇荒”的地方特色，是对“丁戊奇荒”区域研究内容的不断充实。

3. 关注救灾群体的研究

在王国棉的论文[7]中对晋商和西方传教士的赈灾行为进行了叙述，由于西方传教士和晋商的加入，中国的救灾模式出现了新的因素，中国的传统的救灾理念以及赈济制度步入了近代化的历程，赈灾呈现出主体和形式多元化的趋势。

王国棉在论文中对“丁戊奇荒”的灾情和舆情的简要叙述基础上对新型的赈灾群体绅商和西方传教士的赈灾情况的叙述，聚焦于社会群体的救济，却没有对其他社会组织 and 政府部门的救济进行探讨，得出的传统赈灾体系的多元化的结论不够充分，也就是没有对传统的赈灾组织和机构进行说明是不够的。我们把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同时又有别于“官赈”的“义赈”作为一个近代化的标志无可厚非，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那些以民间义赈身份出现的慈善家，或多或少地都与封建官僚有所联系甚至依赖，在不多久，“官赈”中的各种弊端也就不能不传染到“义赈”中去。换言之缺少对于“官赈”和传统救灾群体的探讨，我们就不清楚他们在“丁戊奇荒”中扮演的角色，他们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不仅包括新的救灾群体和救灾措施的出现，也有传统的救灾模式的延续和转变，两者缺一不可。可以说他的论文是规避了新的救灾群体不好的一面。

赵印的论文[8]以一个江南士绅群体的代表人物：潘民表为中心，对他在丁戊奇荒中的赈灾措施进行了叙述并对其进行了高度的评价，最后对《申报》在这场灾荒中对于灾情的传播、劝赈募款、刊发放赈明细、连载善簿的过程中的不可替代作用进行了叙述。作者将潘民表作为“丁戊奇荒”江南士绅阶层的一个缩影，反应了江南缙绅们通过这次赈灾，不仅发挥了传统士绅在维持地方社会秩序和正常运转中的作用，更打破了精英流动在空间地域上的限制，成为串并江南与华北的重要纽带。随着义赈序幕的开启，越来越多的江南士绅活跃在了晚清的政治舞台上，让时人看到这一群体的能量。与此同时，潘民表在赈灾的过程中总结出了一套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赈济措施，比如实地考察各地的受灾情况、刊报劝募、工赈恤寒等都对于华北地区的旱涝灾害预防和治理有所启发。最后我们也看到时人已经开始利用媒体舆论的影响来促进社会治理和流动。赵印对《申报》等相关的核心史料进行了整理，体现了对于新史料的充分挖机，这种由一个人物到一个社会群体的研究体现了社会史以小见大的书写方式。

综上所述，近三年来对于救灾群体的研究多聚焦于新出现的社会群体，对传统的救灾群体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完善。对于新出现的救灾群体的研究既有两两的比较分析，也有对一个群体人物的探讨。在史料运用上也对《申报》等报刊史料进行了挖掘，极大丰富了“丁戊奇荒”的史料。在对人物的研究中做到了从一个救灾群体中抽取出来一个典型人物来研究，却缺少再将人物放回相应群体的视角。与此同时，我们在对丁戊奇荒的救灾群体的研究中，我们要看到传统救灾模式也就是“官赈”的主导作用以及其他赈灾群体对它的依赖性，也不可忽视救灾群体的局限性。

相对于之前刘仰东的专著《灾荒史话》[9]中除了对丁戊奇荒中各省的基本灾情和影响进行了叙述，其中重点对起源于丁戊奇荒中的新的救灾模式的义赈进行了叙述，对义赈的兴起、发展以及运行机制进行了详细的叙述，同时对这种新出现的救灾模式进行了高度的评价，认为它是绅商阶层对社会活动的参

与，是一种社会的渐变，与戊戌变法一同体现了社会前进的大趋势。其对义赈的研究偏向于参与救灾群体的绅商集团的进步性的肯定。郝平在书中聚焦于山西省分别对政府官员、绅商阶层、外国传教士三个不同的救灾群体的救灾措施和效果进行了说明。王国棉对晋商群体和西方传教士群体的研究以及赵印针对以潘民表为代表的江南士绅群体的研究都是对出现过的救灾群体对象的史料补充和进步性的说明论证，王国棉提出的晋商和西方传教士群体的出现推动中国救灾理念和赈灾制度的近代化的观点新颖，以往的研究中一般将这两类群体归类到新兴的社会阶层即义赈的发起群体，义赈的出现通常也被认为是传统救灾理念和救灾体制的近代化的标志，当然这并不包括朱许在《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10]中对于义赈群体的界定及其推动近代化的研究。

4. 灾后治理和重建工作研究

孙志斌[11]硕士论文在广泛史料的基础上，分析山西省在“丁戊奇荒”中受灾如此严重的原因，对受灾后采取了各项措施进行恢复工作，并对各项措施的实际效果进行了探讨希望通过对于措施实施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能为现代灾后治理工作提供借鉴。本文在山西受灾后的治理措施方面进行了全方位的叙述，无论是政治吏治的改革、发展经济和生产力、还是教育文化事业的改革都有涉及，内容非常的全面，同时将“丁戊奇荒”与历史大事件进一步的结合进行了相应的探索。从此处可以看出该篇论文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灾后重建工作的叙述，更是山西社会发展的历史片段。最后在对治理措施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后对两任巡抚的目的和措施进行了客观的评价。该论文在书写的过程中也尝试将历史学与灾害学相结合，运用多种方法去研究丁戊奇荒后的灾后治理问题，将丁戊奇荒与近代大事件对我们进一步研究华北丁戊奇荒灾后治理和教训提供了一个参考。

张力[12]的论文中对于灾后山西善后经费的来源和分配进行了探讨，垦费散发和买谷还仓作为善后经费的两大主要开支，开支费用逐渐由垦费散发向买谷还仓倾斜，但是由于所耗费资金巨大以及在使用善后款项中保持的谨慎和稳妥为核心的地方调整 and 选择策略，两者的实施都面临着困难。张力运用了大量的文史资料、奏折以及方志等方面的史料对善后的经费问题进行了较为细致的阐述，但是其在史料的运用中关注于史料本身的变化，缺少一个对于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没有看到山西善后经费的使用和短缺是由于“丁戊奇荒”的深刻影响，他对整个华北的经济的打击是全方位的，无论是贫苦的农民阶层还是绅商都受到了沉重的打击，朝廷和人民普遍赤穷，无论是垦荒还是买谷还仓都不得不面对一个生产力下降的事实。

综上所述，关于灾后治理与重建方面的研究逐渐引起了学者的更多的关注，这一视角的转变有助于丰富和推动当下的灾荒史研究。这些研究既有对灾后重要官员举措的分析，也有对灾后重建经费问题的来源和使用的使用的研究，可谓是内容上得到极大的丰富。在史料运用方面也比较全面。与此同时，这些研究中也以灾荒问题为视角、将灾荒作为重要的变量来审视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如将这次灾荒与重大历史事件的结合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当然我们也要防止出现“灾荒决定论”的绝对观点。最后，研究灾后治理我们也要有一个从下而上的视角去对整体史的把握。

5. 新闻媒介与“丁戊奇荒”的关系研究

赵莹[13]在她的论文中运用了大量的外文资料和报刊的内容，对“丁戊奇荒”的灾情传播过程进行了梳理。通过对《京报》和《字林西报》的实时报道的整理、对“丁戊奇荒”在国际上的传播进程以及在《京报》等媒体的影响下，“洋赈”的中心逐渐由山东转移到了受灾的中心即山西地区。世界各主要地区也通过这些英文报纸得以了解“丁戊奇荒”的实情，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各地区、不同群体在传播灾情信息过程中获得了话语权，表达了多元诉求。“洋赈”由一种单纯的民间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民族利

益的层面。

赵莹的论文偏向于灾情信息的传播过程说明，是新闻学与历史学学科交叉的有力尝试，但是她的论文对于“洋赈”的具体措施和群体方面缺少相应的叙述，使得这篇论文偏向于新闻媒体的方向。我们不得不承认丁戊奇荒之所以闻名中外，与当时的新闻报刊事业的发展密不可分，无论西方的“洋赈”是出于什么目的，我们都要看到其行为的两面性。

万卉英^[14]的硕士论文将媒介化理论与晚清丁戊奇荒中的赈灾宣传实践相结合，从媒介化动员的角度来理解各主体的赈济活动，将媒介作为原点，建构起“人-媒介-行动”的三元辩证框架。最后对媒介化理论的微观、中观和宏观的影响进行了归纳，即微观上的新闻媒介是赈灾网络中灵活的“行动者”；中观上具有独立性的新闻媒介对其他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力量产生影响；宏观上的新闻媒介通过对洋赈和义赈竞争态势的渲染强化了江南士绅的民族情感，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得以产生。本文充分挖掘了相关的史料，既有官方奏折、政书、史书和方志，也有报刊、日记等史料，在丰富史料的基础上在文中大量运用了比较的分析方法，其中有对“丁戊奇荒”时期的媒介环境、赈灾情况与本次灾荒前后各两次的灾荒的媒介环境、赈灾情况进行了比较，得出中国赈灾系统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以及此次灾荒的媒介的特殊性；也有对此时期的灾荒救济中的不同群体网络进行比较，即官赈网络、义赈网络、洋赈网络三者进行比较媒介使用的情况和效果。

万卉英的论文将媒介化动员与“丁戊奇荒”的结合，为我们研究“丁戊奇荒”打开了新闻传播影响下的新视角，作者对微观、中观和宏观理论的实际运用，不免让人想起布罗代尔的“三时段”理论，即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所对应的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个别时间。很显然我们能在这篇论文中看到作者对于布罗代尔理论的灵活运用。

综上所述，新闻媒体与灾荒关系的研究是最近兴起的一个新的研究视角，极大地丰富了灾荒史的研究内容，让我们明白新闻媒介在灾情传播、鼓励赈济、灾后重建等工作中扮演的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也可以看到学者将新闻媒介的相关理论与历史学理论相结合研究的尝试，这是对灾荒史研究方法的一个新的突破。同时也是对报刊史料充分利用的有力实践。当然，在历史叙述的过程中，我们也要避免陷入新闻学学科属性当中去，真正明白什么才是主干、什么是枝叶的陪衬，切不可生搬硬套。

6. 关注受灾群体的研究

近三年来仅有高雅^[15]的硕士论文是关注的受灾群体的研究，她在文中将女性作为受灾群体进行研究，探讨她们在面对灾荒时的应对措施，与此同时传教士的救济开办了女子学堂，为之后女子教育的发展和山西女性思想的解放奠定了基础，学堂的设立和灾荒的实情也对束缚女性的一些如缠足等不良风俗产生了动摇。“丁戊奇荒”对于女性来说无疑是一场更深重的灾难，也是女性意识觉醒的转折点。

高雅在这篇论文中以女性的视角对“丁戊奇荒”的灾情进行了分析，展现了灾荒大背景下女性意识和民族观念的变迁，是对“丁戊奇荒”研究视角的创新，不就灾荒言灾荒。从这篇论文中我们可以看出学者对于女性整个特殊群体的关注度，以女性视角来对“丁戊奇荒”的受灾群众进行研究并不是首例，在之前闫娜珂^[16]等一些论文也都是将女性与灾荒两者结合起来研究。高雅实质上是用现代化的范式对灾荒中女性意识的觉醒、思想观念的转变等等进行研究，综合运用档案、碑刻、方志、笔记、报刊等多元史料，系统探究灾荒中女性的各种行为及其内涵，以国家和地方、官方和社会等多重视角为切入点女性的行为进行研究。在灾荒中女性群体的研究也是属于一个热点话题，值得我们关注，受灾群体上当然不只有女性群体，对于其他的受灾群体需要我们进一步的研究，比如按照年龄来分的老人群体、幼儿群体，按照阶层来分的佃农群体、地主阶层、商人群体等都可以作为研究的视角，这些都需要我们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不断的挖掘，这样“丁戊奇荒”的研究内容就会更加丰富，也会给我们一个更全方位的研

究图景展示。在之前的研究中更多地关注于“丁戊奇荒”中整体受灾群体，没有针对女性等特殊群体的研究，任何受灾群体的研究不拘泥任何一种研究理论，现代化理论只是一种尝试。

7. 展望

我们从近三年来丁戊奇荒的学术论文来看，“丁戊奇荒”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视角都有所创新和突破，慢慢地也从“丁戊奇荒”本身中走出，更多地关注政府、民间、社会力量对于灾荒的认识、态度、观念、举措以及社会关系的演变。这场灾荒表现的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等其他方面的紧密联系展示出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和突出地位。针对在“丁戊奇荒”的研究中的不足，我提出了一些展望。

“丁戊奇荒”的研究要避免“碎片化”。研究区域性的灾荒史并将灾荒作为审视某一区域社会历史变迁的一个重要视角，已经得到了学界广泛认可，这既体现了灾荒史研究学术视角的转换，也推动了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为认识生存环境与区域特性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观察视角。在此情况下，选取特定区域，进行综合研究，通过区域关照整体，才是切实可行的研究路径。区域性的研究“丁戊奇荒”也要避免陷入“碎片化”的陷阱，那么在选取限定区域时就不能就区域言区域，要将区域内各要素以及区域与整个“丁戊奇荒”之间有机地联系起来进行讨论，越是小范围的区域研究比如县级单位就越不能忽视该区域与周围地区的关联，比如灾后重建工作的物价稳定研究就需要关注于区域经济的调控功能等。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将视野陷入既定史料，不能就史料谈史料，真正做到“小地方大历史”，关注史料自身产生的背景、意图，防止陷入“碎片化”。

“丁戊奇荒”与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学者们在研究丁戊奇荒史中应该摒弃了通常那种专业化分工的做法，形成了更具综合性和动态特征的研究视角，由此对于许多灾荒问题的考察深度和对灾荒具体内容的挖掘才能够做到言人所未言，见人所未见。换言之就是要避免就灾荒言灾荒的叙述，将灾荒置于一个更为宏大的范围中去探究。比如孙志斌的论文中就将灾荒与重大政治事件相结合来看待山西省的近代化进程，都是从“丁戊奇荒”的专门研究中走出来放宽视野的成果。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李文海教授的率领下开展了灾荒与近代社会生活互动关系的研究，并发表了相关的论文，在论文中，他将灾荒与历史中的重大历史事件结合起来，将清末的灾荒作为重大历史事件的一个重要变量来分析，打开了灾荒史的新思路，与此同时，“使灾荒史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17]。然后将“丁戊奇荒”与重大历史事件相结合的研究至今依旧凤毛麟角，需要更多学者去拓荒。

“丁戊奇荒”与义赈的发展。义赈作为在丁戊奇荒中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救济体制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文海在1993年发表的《晚清义赈的兴起与发展》，第一次介绍了义赈活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全过程。自此之后近代义赈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根据知网的数据统计有关义赈的论文到目前为止已经达到了一百多篇，对于义赈在丁戊奇荒中的作用和运作机制上学者们也多有涉及，但是对于义赈的评价上却有不同的声音，有学者认为义赈的兴起是中国近代救灾机制近代化的标志，就如上文提到的刘仰东的专著就持此观点，也有学者认为义赈不过是一些人的发家之路罢了，并指出“自义赈风起，或从事数年，由寒儒而致苏丰”。朱泮[10]在其书中针对义赈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义赈的兴起与地方性逻辑发生了直接关联，而这些传统资源带有浓厚的江南谱系色彩。目前来看还未对义赈的地位形成统一的共识，仍需学者们进一步探究。

“丁戊奇荒”的研究采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学科交叉已经是一个普遍的趋势，近三年的研究中将新闻学、传播学与历史学进行结合来研究“丁戊奇荒”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比如灾害学、人类学、地理学、文学等都可以进行交叉性地研究“丁戊奇荒”。比如灾荒文学也是一个很好的角度，学者们可以根据灾荒文学中的内容与丁戊奇荒各地的实情进行对照，是可以解读出灾荒的特征和危害的独特呈现形式

的,也是可以看出“丁戊奇荒”对于当时文人和文学的深刻影响的。文学与史学的结合已经不是新鲜事了,灾荒史和灾荒诗歌的结合也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路径,或许灾荒诗歌等文学作品在文学界并不是什么惊世骇俗的佳作,但是它们以朴素真实的笔墨再现了丁戊奇荒的真实情况,这个时候的诗歌就是灾荒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学者们在研究灾荒诗歌的时候也要仔细甄别内容的真实性。简单来分其实就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同自然科学工作者的结合,任何一支队伍的孤军奋战都无法对“丁戊奇荒”的历史全貌做出完整、全面和准确的判断。两支队伍可以针对“丁戊奇荒”中的共同问题、重大课题,带着问题意识一起进行联合攻关,增强相互之间的渗透和学习,一定可以用创新之路大大推动“丁戊奇荒”的研究。

“丁戊奇荒”的基础研究与现实应用研究相结合。近三年的研究很少关注现实的需求,其实李文海在他的书中就已经很好地为我们将灾荒史和现实应用研究相结合提供了模范,他探讨了灾荒史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关系[18],在“丁戊奇荒”方面的叙述中,不仅对灾害的发生、程度、影响范围、造成的危害以及清政府救济措施和弊端做了具体充分的描述与分析,也对这场灾荒同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以及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进行了探究[19]。推动“丁戊奇荒”的研究以及灾荒史的进一步发展,学者们也要时刻将自己的研究紧跟实际的需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学术发展史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学术,任何一个学科,只有存在着巨大的社会需求,并且这种客观需求越来越深刻地为社会所认识和了解时,才可能得到迅猛的发展和进步,社会需求是推动学术发展的和繁荣的最有力的杠杆。”[20]“丁戊奇荒”留下的史料文字背后是华北各地区百姓的深重苦难,这些苦难是我们永远也不应该忘记的,因为苦难会成为推动我们投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事业的强大精神力量。

参考文献

- [1] 王鑫宏.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丁戊奇荒”研究综述[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9, 11(4): 109-114.
- [2] 阎允澜. 论“丁戊奇荒”期间青州府的灾情与救济[J]. 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 43(2): 19-24.
- [3] 朱海啸. 山西各州县光绪新修方志中的丁戊奇荒记忆[J]. 太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27-35.
- [4] 连伟光. 泽州府“丁戊奇荒”考略[J]. 晋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16(1): 1-5.
- [5] 武超逸. “丁戊奇荒”时期平遥县的灾情与赈济——基于光绪版《平遥县志》记载[J]. 晋中学院学报, 2023, 40(5): 59-62.
- [6] 郝平. 丁戊奇荒——光绪初年山西灾荒[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7] 王国棉. “丁戊奇荒”的社会应对与传统救灾模式的近代化转型[J]. 东岳论丛, 2021, 42(10): 69-76.
- [8] 赵印. 在事精勤: 丁戊奇荒中的潘民表[J].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0(6): 77-81.
- [9] 刘仰东, 夏明方. 灾荒史话[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1.
- [10] 朱浒. 地方性流动及其超越[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11] 孙志斌. 山西丁戊奇荒灾后治理及其经验教训[D]: [硕士学位论文]. 昆明: 云南大学, 2022.
- [12] 张力. 垦荒与还仓: “丁戊奇荒”后山西省善后经费的筹措与使用[J]. 中国农史, 2022, 41(4): 84-95.
- [13] 赵莹. “丁戊奇荒”中的灾情信息传播与“洋赈”[J]. 全球史评论, 2021(1): 179-194+345-346.
- [14] 万卉英. “丁戊奇荒”中的媒介化动员[D]: [硕士学位论文]. 南宁: 广西大学, 2023.
- [15] 高雅. 灾荒视域下的女性社会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西安: 西北大学, 2021.
- [16] 闫娜轲. 羸弱与担当: 灾荒视域下的清代妇女及其家庭反哺——以《流民记》为中心的考察[J].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4): 118-128.
- [17] 苏全有, 郑伟斌. 李文海与中国近代灾荒史研究述评[J]. 防灾科技学院学报, 2008, 10(4): 100-105.
- [18] 李文海. 灾荒与饥饉 1840-1919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1.
- [19] 李文海. 中国近代十大灾荒[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 [20] 李文海. 进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灾荒史研究[J]. 安徽大学学报, 2005(6): 1-5.